

国情研究：开“可持续发展”先河

中国科学报社 易蓉蓉

“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

“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

发端于中国科学院的国情研究，在 20 多年前就预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提前敲响资源紧缺的警钟。

如今，20 多年前开拓的国情研究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引领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预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矛盾

1986 年 7 月 27~31 日，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发表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被送到邓小平的案头。

邓小平阅后批示：“很好，全文发表！”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陈云的肯定：“这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万里的文章。在决策

国情研究：开“可持续发展”先河

“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

易蓉蓉

“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

“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

发端于中国科学院的国情研究，在 20 多年前就预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提前敲响资源紧缺的警钟。

如今，20 多年前开拓的国情研究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引领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986 年 7 月 27~31 日，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发表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被送到邓小平的案头。

邓小平阅后批示：“很好，全文发表！”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陈云的肯定：“这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万里的文章。在决策

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国情研究作为软科学研究的先行者，在探索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国情研究不仅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社会各界认识国情、转变观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国情研究的深入，我国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情研究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将继续深化国情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国情研究是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软科学发展的关键力量。

《科学新闻》2012 年第 6 期
2012 年 6 月 6 日

研究中引入科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成为当时执政的共同理念。

在此背景下启动的国情研究，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带有历史必然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1986年年底，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对中国农村基本国情进行分析研究，评估中国农业发展的“后劲”，并要求“开门见山，一语道破”。

中科院有关部门找到时年近8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问他是否愿意承担此项工作。周立三预见这是十分重要的地理科学研究新领域，同时又是十分艰巨和困难的工作。他欣然领衔承担，并立即组织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生态环境中心、系统科学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一批科研骨干和青年科技人员组成国情小组。

小组里的年轻人，都是一时之选，其中包括后来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孙鸿烈、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锡康等。

所谓国情，是指每个国家具有自己特色的总体实际情况，包括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乃至历史文化传统与国际环境等。既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情况，也有不断变化的具体事实。

周立三曾领导的新疆综合考察和农业区划研究等都是“大兵团合作”。他的高瞻远瞩和综合能力是学术界出了名的，也是他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因素。然而，此番国情研究非比寻常。周立三敏锐地意识到：“地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综合集成！国情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超越地理学的研究、集大成的研究。”

对于中国国情现状，当时社会上有两种认识：悲观的人只看到不利方面，如人口过多、人均资源量很少、人口的科技素质和教育素质很低、经济基础很差、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1/40等。盲目乐观的人只看到有利的条件，有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在很短时间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对于决策而言是致命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追求快速致富，有水要快流，不惜破坏

资源环境，不顾后果。”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回忆说，“当时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持这样的看法。”

对当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周立三明确提出：这是一种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当时周光召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周立三见到他，就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给周光召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立三）使我迅速认识到国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必须先行一步的基础科学研究。”周光召对小组提出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的要求，这12字成为国情研究的宗旨。从1990年起，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中科院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都对国情研究课题给予长期支持和资助。

1989年10月，国情研究小组发表了第一份报告《生存与发展》。周立三概括出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存在“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及“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两个基本矛盾，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过程应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采用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这对沉浸在“地大物博”梦中的人们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至今看来，国情研究小组当时提出的中国发展面临多重困境、现代化要打持久战和要走非传统发展模式这三大观点，仍然振聋发聩。

高度综合的科学研究

国情研究是高度综合的科学研究，它不但需要对决定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物理空间进行真实、准确的认识，还需要进而深入综合分析，给出趋势性判断，并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思路 and 对策。

周立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6年起与周立三共事10年的胡鞍钢回忆说，周立三“不仅要求我们做出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表达，还要做到‘雅俗共赏、一看就懂、便于记忆’的社会表达”。

国情小组反复锤炼，精思苦吟，最后在《生存与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中国国情：“人口过多，底子过薄，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

这是中国国情最基本、最核心的表述。报告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

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宗旨，在大量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与数据基础上，熔观点与材料于一炉，一问世便激起了强烈反响。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续两期发表该报告重要研究成果，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直接向周光召索要报告全文。周立三先后向周光召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负责人作了汇报。邓小平予以高度评价，主张让全国人民了解国情。

在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龙新民和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原司长邓楠的领导下，课题组成员胡鞍钢和王毅根据国情报告的主要成果，执笔撰写了国情教育系列电视片文稿，在北京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播出。

周立三器重年轻人，满腔热忱地支持年轻人，鼓励青年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带着大家反复讨论、摸索经验，起草了《生存与发展》报告的命题，但把主笔的重任交付于思想活跃的胡鞍钢。

1992年、1994年、1995年，国情小组分别发表二、三、四号报告。第二号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针对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与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相结合的战略思想。

第三号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提出城乡协调发展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

第四号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是对前面三个报告的总结和展望，对中国发展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提出包括稳定和渐进、持久战、适度高速发展、高度开放和科教兴国等五大基本战略及相关对策。

周光召评价说：“周先生对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地学工作者，包括他自己，对各地的广泛而深入调查的结果之上，论据非常充足。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国情研究成为中科院重点支持的一项工作，而且重点向社会推介，让各级领导和社会大众了解中国的实情。”

“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当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气概，不顾及偏见和压力，率领国情小组向全中国发出了适时的提示与忠告，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表率。”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学术秘书孟辉因工作关系对周立三十分熟悉。她说：“真正的科学家，不仅能够看到问题，更主要是在现实中针对重大问题身先士卒进行认真、

翔实、慎重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其观点既现实又超前，更为历史所验证。”

延续与扩展

研究领域覆盖更加广泛，学科交叉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持续至今的国情研究，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发挥着支撑、示范和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历经几十年的沉淀积累和创新发展，中国科学院已经建立起资源环境基础科学数据中心，在国家区域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建设领域，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和人才库。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已先后主持完成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国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东北振兴规划、汶川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等数十项国家级规划。

有关专家两次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分别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讲解。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毅介绍说，仅2006~2010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上报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中，就有130份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纳，其中80份得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服务国家宏观决策的成效较为显著。

从国情研究肇始并延续至今的，还有一个优良的精神传统：国家责任至上，科学精神至上。

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的中国，国情也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尽快为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找到出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科学家们始终未敢忘怀。

中科院地学部主任秦大河表示：“科学家如果不站在国家的肩膀上考虑问题，是对不起国家的。中国环境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科学家群体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只有尊重科学、尊重科学事实的人才能坦诚直言，才敢提出切中要害的对策性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说，科学家需要说“不”的勇气和智慧。他早年曾跟随周三考察新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情况，2004~

2005年组织编写了关于“全国功能区的划分及其发展的支撑条件”研究的院士咨询报告，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功能区划的内涵特征及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份报告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的相关部分产生了突出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形成主体功能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升为“国家战略”。

陆大道等人2007年提交《关于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建议》报告，以丰富的数据和图片资料阐述了“九五”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和处于失控状态的空间扩张，分析了冒进式城镇化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的矛盾，明确提出和论证了我国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条件不能够支撑如此高速度城镇化及其空间扩张，阐述了中国必须要走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道路。

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报告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是涉及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明确我国城镇化的方针、政策，不仅有紧迫性，而且有长期战略意义。建议由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承担这项工作，成果报国务院。”

让陆大道颇感欣慰的是，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已经缓解。

陆大道等人2010年递交《关于避免我国交通建设过度超前的建议》，直陈应该对包括高速公路和高铁在内的交通设施大规模超前建设亮“黄牌”，“我国交通建设严重超前”，部分城市的地铁建设和经营模式须科学论证，不能盲目，应探索合理的建设经营模式。

半年后，发生了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国高铁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高铁、高速公路、支线机场、大型深水港口泊位、轻轨铁路等建设开始降温。

国情研究到底留下什么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学）研究，因国情小组而衍生。这是以当

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既多学科研究、又跨学科研究，既专业性研究、又综合性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情研究所产生的公共知识不仅产生了极大的正外部性，而且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

在国情研究走过的 20 多年里，在提倡、推动和实践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以及制度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重大问题导向、战略思维、公共关切和通俗的社会化表达是国情研究成功的策略。

国情研究是中科院扮演“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成功实践，它综合了中科院以及科技界长期以来积累的自然资源考察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建立经济系统模型等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大量定量分析。一些报告还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经过十数次修改而成。

国情研究小组内部讨论最反对人云亦云，最反对炒冷饭，而是要求大胆创新、善于创新；最反对自我封闭，总提倡要突破前人、突破自己；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社会，总提倡要将国情研究成果转化为战略决策和社会效益。

对于国情研究，周光召曾经有一段饱含深情的话。他说：“要把国情研究的科学精神传承下去。科研人员空谈爱国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脚踏实地做科研，做出有真知灼见、有预见性的、有前瞻性的成果，能够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周立三先生眼光超前，提出中国发展将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有沉痛的教训。……科学家还要继续做工作，考察、分析，再提出问题解决方法，总结，使问题彻底解决。我们希望，中国不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